

父亲和我

（代序）

父亲去世已经多年了。无论我在内心深处如何痛苦地呼唤，无论我走遍天涯海角，再也不可能见到他的音容笑貌，再也不可能听到他朗朗的笑声，再也不可能像前两次那样，父亲奇迹般地“死”而复生，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了。这一次，他是真的走了。他走得那样匆忙，走得那样安详，又走得那样的无牵无挂。也许他真的累了。在他那漫长而又短暂的 82 个春秋里，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、大悲大喜，经历了那么多的惊涛骇浪，电闪雷鸣，又承受了那么多有形无形的荣辱褒贬、悲欢离合。他是真的累了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就头也不回地撒手而去，把我这个与他相依为命几十年、遍尝人生苦果的女儿，推进了不知所措的痛苦深渊。

在我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上，父亲“死”过三次。他的每一次“死”都无形中把我的生活和命运重新作一番“安排”。

不过，他这一次的“死”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小，但心灵上的震撼和创伤却是最大。

父亲的第一次“死”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。当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六人旅居香港，听说父亲在云南参加了云南省主席卢汉领导的和平起义。母亲估计父亲很快就会到香港接我们一家返回大陆。孰料左等右等，竟音讯全无。情急之下，母亲决定让年仅 24 岁的舅舅带两个孩子先回大陆寻找我父亲。找到后，她再带着其他的四个孩子回来。最初，母亲准备让舅舅先带比我大一两岁的三姐和四姐回来。可是命运弄人，正在这节骨眼上，三姐患急性肠炎住进了医院，四姐和我们一起外出买泡泡糖时，被汽车撞断了胳膊，也进了医院。剩下的四个孩子中，母亲最爱聪明伶俐的二姐和年仅一两岁的弟弟，随舅舅回大陆寻找父亲的“任务”就落在了我和有些弱智的大姐头上。那时我四五岁，大姐也才十一二岁。我只记得有天夜里，母亲从睡梦中把我抱起来，亲吻了一下，随即我们便登上了北上的火车。我们那时都太小，只觉得一切都很新奇，特别是火车过隧道时，一会儿车窗外一片漆黑，一会儿光明如昼，很有趣，根本想不到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。

我们回大陆不久，就传来了父亲被“镇压”的消息，据说父亲的灵位也摆进了台湾的忠烈祠。母亲自然不敢再回大陆，而大陆也开始了“镇反”运动，带我们回来的舅舅被当成潜伏特务枪毙了；弱智的大姐在无人照顾且饥寒交迫的情况下，病、饿而死。年仅四五岁的我顿时成了无父无母、举目无亲的

孤儿。若不是善良的伯外公、伯外婆收养了我 供我读书 或许我早已落到了大姐的下场。幸亏我那时实在太小 孩子的天真、懵懂帮我渡过了那十几年缺衣少食，且无父爱母爱的童年。加上对父亲毫无印象 所以父亲的“死”对我心灵上造成的阴影并不严重。

1961年初冬之际，我的一位表舅突然兴致勃勃地来到伯外公家里 指着一张《人民日报》上的特赦战犯名单说：“您看 五妹子的爹还活着。这名字 这官衔不是沈三哥是谁？”

伯外公眯着老花眼瞅了半晌，对在一旁糊火柴盒的我说：“你爸还活着 你以后就不用跟着我们受罪了。”

伯外公原是日本留学生，解放前家父曾介绍他在湖南铁路警务段当过一个时期的文书 加上解放后 我那被镇压的舅舅从香港回国就带着我们住进了他家 所以他被打成坏分子，一直没有工作。我小时候，伯外公和伯外婆去建筑工地捶石子，帮人家洗衣服来糊口度日。后来 伯外婆去烟厂当工人 表舅舅也从卫生学校毕业 参加了工作 伯外公才留在家里 带着我糊火柴盒 挣钱补贴家用。我每天放学回家就跟伯外公一起糊火柴盒。伯外公为了让我 不打瞌睡 常常边干活边给我讲故事，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里的故事 全是伯外公当年讲给我听的 我后来对文学的爱好 也是得益于伯外公的言传身教。当时，我对伯外公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毫无印象的父亲，甚至对“沈醉”这个名字都感到十分的陌生。所以 我对父亲的“死”而复活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激动。

不久 父亲从母亲寄给他的信中得知了我的下落 即写信跟我和伯外公联系 并要我暑假去北京相见。父亲当时正在北京红星公社旧宫大队劳动，为了见我一面，他自己节衣缩食，从每月 60 元的工资里攒出一些钱，寄到湖南，给我当赴京的旅费 同时寄去一件用他自己睡裤改制成的小短袖衬衣 让我穿着他亲手做的这件蓝白相间的小衬衣去北京 作为我们父女接头的标记。

那年我刚刚 15 岁，正在上初中。首都北京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毫无印象的父亲。在北京站下车时 我努力地想像着父亲的模样。在我的想像中 父亲应该是一个高高大大、白白净净的中年人 所以 我在人群中寻觅着想像中的父亲。当旅客都走得差不多时 突然一个身材高瘦 皮肤黝黑 穿着塑料凉鞋 西式短裤和白布短袖衬衫 像个乡巴佬似的中年男子喊着我的小名，从月台的另一头向我跑来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心想 这个黑不溜秋的老头 难道就是我的父亲？孩子 我是爸爸！”父亲跑过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激动地看着我 黑色眼镜框后面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，盈满了泪水。

理智告诉我，他确实是我的父亲，我应该叫他一声“爸爸”。但是“爸爸”这个词对我而言实在是太陌生了。我怯怯地望着他 嘴唇蠕动了半晌 才轻轻叫了一声“爸爸”。

我看见父亲的眼泪夺眶而出 激动地望着我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出了车站 父亲把我领进了附近的崇内旅馆。那次 我在北京只呆了七天。这七天里 父亲尽量让我吃好、玩好 他陪

我去游览故宫、北海、天坛等名胜古迹，带我去吃我从未见过的西餐、北京烤鸭和其他北京风味的食品，甚至冒着酷暑赶回旧宫大队给我买来刚摘下的西红柿和西瓜……在这短短的七天里，我深深感受到了父爱的温馨，对父亲也有了一份感情。不过，我在七天后返回湖南时，仍然是兴高采烈的，因为我对伯外公及湖南的思念，远远胜过与父亲的离别之情。多少年之后，我才从父亲当时的日记中得知，他为了能见上我一面，为了让我在北京能吃好、玩好，一连几个月都在节衣缩食，并起早贪黑地撰写文史资料，为的是节省下粮票，多挣些稿酬，让我到北京来食、用。他同时也一连七个星期天没有休息，好存下假期来陪我。其舐犊之情真是发自肺腑。惭愧的是，我当时根本不能体谅父亲的一片苦心。

1962年，父亲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。我也正好初中毕业。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下，我由长沙迁到北京，凭着长沙七中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就进入北京女六中上高中。上高中的三年中，父亲真是又当爹又当娘，从我的饮食起居直到学习、娱乐，无一不是他亲手照料。节假日里，他不是带我去北海荡桨，就是到昆明湖游泳，或者骑车远涉去逛十三陵、八达岭，去欣赏香山的红叶，去比赛爬鬼见愁……那段日子，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时光。我觉得父亲简直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他不但炒一手好菜，而且会缝制衣裳，他亲手给我缝制的小棉背心，针脚又细又密，而且穿在身上特别贴身合适。他不但划船划得好，而且游泳技艺特高，他常常

可以双手抱膝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水面上 让我抓住他的两个大脚拇指练习游泳。那段日子 我真正体会到了父爱的温馨 也给予久经铁窗之苦的父亲以极大的慰藉与欢乐。家父曾在日记中这样写到：

昨夜睡了都在梦中高兴得笑了起来。白天逗孩子的事在梦中也一样出现。日子熬出头了 新生活开始了。我怎会不高兴呢？.....

.....孩子是费尽心思在安慰我 事事依我。我对她这一片孝心深深感动。今后长时间父女相依为命地活下去，我不得不为她的健康和兴趣着想 让她能愉快地生活在我身边。我真想不到 我晚年只有这个小女儿能给我这么大的安慰.....

.....孩子马上要考大学了，我为她准备明天的午餐，想买点面包。孩子还像小狗狗一样哼哼唧唧地不同意 问了几句要吃什么 她才说要月饼 引起我大笑一场。多有趣的动作呵！做父亲的看到这些情景，心头特别感到有趣.....

遗憾的是 好景不长。在我即将高中毕业之际，《红岩》小说风靡全国 我从同学和老师嘴里得知 小说中“严醉”的原型就是我父亲。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，《红岩》中那个罪行累累的军统特务头子“严醉”会与我身边这个慈祥可

亲的父亲是同一个人。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。因为父亲的关系 我不能加入共青团 因为父亲的关系 没有一所大学敢录取我。为此，我偷偷地哭了好几次，父亲更是难过得寝食不安。特别是他多方奔走 得知我未能考上大学完全是因为他的历史原因时 他更是痛苦万分。他不能理解 既然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 又不唯成分论 重在政治表现。我这个3岁就离开他 四五岁就离开母亲 在穷亲戚家长大的女儿又何罪之有？为什么政府和人民已原谅了他以往的罪过 却不能原谅他这个自幼孤苦伶仃、寄人篱下的孤女 为此 他甚至想到去死 以解脱我的“罪孽”。事实上 我们都清楚 即使父亲死了，也无法洗清我身上的“原罪”。自从母亲决定把我送回大陆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我必须为父亲的过去无休止地“赎罪”的命运。

当时，我的思想既传统，又正统。我憎恨父亲过去的罪恶，认为“父债女还”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决心努力工作学习 好好听党的话 以自身的努力来偿还父亲解放前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行 以求得党和人民对我的谅解。同时 我又深爱着我现在的父亲，一想到我将来离开他后 他孤身一人生活会更加寂寞孤单 会更加思念我那早已改嫁的母亲时 我便忍不住催促他赶快给我找个后妈。父亲最初说什么也不愿再次结婚 还在幻想着我母亲有一天能回到他的身边。于是 我连撒娇带耍赖地求他说：“爸 你就赶快给我找个妈吧。我长这么大 还没尝到过有妈的滋味呢。”

父亲被我缠得没有办法 答应考虑再婚的事。正巧有人同时给父亲介绍了两个女人。一位是理发员，30岁出头，有一个几岁的小男孩；另一位是一个街道医院的护士，40岁，没结过婚。父亲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便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还是娶那个没有结过婚的护士吧！”我的这一句话促成了父亲和继母的婚事。不过，父亲结婚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事情远不如我以前想像的那么简单。继母一进门，父亲便成了她的“专利”，连以往每天晚饭后，坐在父亲身边，听他讲故事的乐趣都成一种奢望。继母与我格格不入，形同路人，加上我当时既不能上大学，又没给我分配工作，整天在家面对继母那张不苟言笑的面容时，我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

父亲结婚三个月后，正赶上宁夏建设兵团到北京招收支边青年。我听了一两次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关于“听毛主席的话，到贫下中农中接受再教育”及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知识青年在那里大有作为”的报告后，便决心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。一方面我认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建设农村，建设边疆，既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，又是摆脱出身的影响、投身革命、为父亲的过去“赎罪”的机会；另一方面也是避开家庭中那种尴尬局面的好办法。毕竟将来我早晚会离开父亲，是继母跟他过一辈子，我又何必夹在中间，让父亲左右为难呢？于是我背着父亲，偷出户口本，报名去宁夏建设兵团。当我得到批准后，才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。父亲一听，顿时惊呆了，半晌他才老泪纵横地仰天长叹道：“天呵，为什么我惟

一的女儿都不能留在身边？”

我当时认为，能被批准去宁夏建设兵团是一件光荣的、值得骄傲的事，根本不能理解父亲内心的痛苦，反而嗔怪地笑道：“爸，别傻啦，这不是为了我将来的前途吗？”父亲难过地直摇头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

走的那一天，北京火车站红旗飞舞，锣鼓喧天。北京市委组织了许多人到车站为我们送行。我们一千多支边青年身着没有领章、帽徽的黄军装，胸佩大红花，列队走进月台。月台上，送行的亲人们围着自己的孩子依依惜别，许多父母和支边青年都哭得像泪人似的。父亲和继母也赶来了，为了表现自己的坚强，我强装笑脸地望着热泪盈眶的父亲说：“爸，别哭，别让人家笑话。”父亲的泪水还是夺眶而出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哽咽地叮嘱我注意身体，常给他来信……

催促我们上车的铃声急骤地响了起来。知青们纷纷告别亲人登上火车，我也随着人群往车厢走去。就在我即将登上火车的那一瞬间，紧跟我身后的父亲下意识地拽住了我的胳膊，但马上又放开了。就在这一拽一放之间，我的心震颤了。我意识到父亲那舍不得我离开，却又无法阻止我的悲痛心情。但我还是咬紧牙关，头也不回地登上火车，强着欢颜地伏在车窗上，冲着老泪纵横的父亲连连挥手。火车开动时，父亲还跟着火车，步履蹒跚地跑了几步。当父亲的身影渐渐变小、渐渐消失后，我再也忍不住让泪水倾泻出来，心里暗暗地哭喊道：“别了爸爸，别了北京！”那时的印象，至今仍刻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父亲的第二次“死”是在我到兵团后的第三年。那时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。我与几个知青一起回北京探亲。父亲那些日子正为全国各地来上访的造反派写证明材料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和父亲都认为能在毛主席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出点力，做些有益的事情是无尚光荣的。父女见面格外高兴，谁也没想到会大难临头。我在北京盘桓了半月。就在准备第三天返回宁夏的那个夜晚，我突然被继母慌慌张张地从睡梦中摇醒，一睁开眼就看见两个彪形大汉紧跟继母身后，闯进了我的小卧室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吓得光着脚跳到了地上，连忙往外屋跑去。我刚走进外屋，就听见另外一个着便服的陌生男人正在对父亲宣读拘捕令。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顿时变成了一片空白，像被人施了定身法一样，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能动，只是茫然而恐惧地望着父亲和来人。

父亲看上去很沉着、镇定。他在拘捕令上签了字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两份写好的上访证明材料交给继母，冲我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没事。”说完就跟着来人走了。

继母哭着追了出去，而我仍然呆呆地站在原地发愣，隐隐约约觉得这情景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，是梦，是电影场景。半晌我才猛然想起这场面曾经确实发生过，那是我四五岁时，也是在睡梦中被人摇醒，眼睁睁地看着几个人把带我们回来的舅舅，从伯外公家押走，不久就听说舅舅死了，被镇压了……

院外汽车发动的声音和继母返回的关门声把我从麻木痴呆中惊醒，我这才意识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将意味着什么，一想

到父亲很可能像舅舅那样一去不返，想到我将再一次失去父亲这大陆上惟一的亲人时，我再也忍不住扑倒在父亲的床上，大放悲声。继母被我这扯心裂肺般的哭声吓了一跳。她连忙带着哭声哀求似地说：“别哭啦，别哭啦，让人家听到更不得了呵！”

此时此刻我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？哪里还控制得住自己的悲恸？我索性把被子往头上一蒙，昏天黑地的哭了个死去活来，哭累了就昏昏睡去，一醒来又禁不住放声痛哭。当时我有一种天塌地陷般的感觉，有一种世界末日般的恐惧和悲哀。

天亮之后，我还是挣扎起来，骑车去父亲工作的全国政协，去当地派出所、街道办事处，甚至闯到位于长安街的公安部去打听父亲被关押的地方，希望在我返回宁夏建设兵团之前，能再见父亲一面。可是我奔波了整整一天，也未能打听到父亲的下落，谁也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，甚至谁也不清楚是什么人抓走了他。

第三天，我只好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和恐惧离开北京，返回了宁夏。

当时人们都讲究靠拢组织，向党组织交心，反映家庭的情况，我自然也不敢对组织隐瞒。当连队指导员听到我父亲被拘捕的消息后，对我的态度马上变了，三天两头地召开群众大会，让我交代父亲的罪行。事实上，父亲解放前的罪行我一无所知，解放后若有什么罪的话，恐怕连父亲自己都不清楚，我又从何交代呢。站在全连的批判大会上，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

谈自己对家庭的认识，表示要与父亲划清界线，努力改造自己。即使这样，连队领导还是不肯放过我。我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监视。我从每月 24 元的工资里攒下 48 元钱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，竟被人说成是电台，说我是解放初期潜伏下来的特务；我当时没有找男朋友，就说我是想往国外逃跑，去投奔国外的亲人。我所在的连队成立武装连，就把我调往十几里外的生产连队。当时我几次想自杀，但又怕死后背上个“自绝于党，自绝于人民”的罪名。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子，惟一的出路大概也只能是结婚嫁人，成为他人之妇之后，才能稍稍地减轻一点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。然而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，哪一个有点政治头脑的人敢娶沈醉的女儿，哪一个有点文化知识的人敢沾沈醉女儿的边，可是要我嫁一个毫无共同语言的当地农民，我又实在心不甘。我总盼望着父亲的问题有个水落石出之后，才考虑个人问题。一年过去了，父亲消息全无；两年过去了，父亲依然如石沉大海；第三年，第四年，我和继母都完全绝望了。我们都认为父亲早已死了，否则不可能一点消息没有。在那个年代，造反派打死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原国民党少将，还不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轻而易举吗？

就在父亲音讯全无的第四年，也就是 1971 年，我 26 岁的时候，再也顶不住了，万念俱灰地把自己嫁给了当地一个忠厚老实的工人，作好了老死西北边陲那偏僻农村的打算……

命运之神仿佛故意在玩弄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。就在我结婚一年之后，我的长子刚刚出世之时，在月子里，我就接

到了父亲从秦城监狱辗转寄来的一封信 说他没事了 只是在监狱里被“监护”了五年 现在就要被释放 重新回到全国政协工作了。我看着父亲的信 禁不住热泪盈眶 父亲居然还活着，我又不曾是举目无亲的孤儿了。随即我又忍不住放声恸哭 哭自己五年来不明不白受的那些磨难和委屈 哭自己因父亲的五年“监护”而赔上的婚姻、家庭以及后半辈子的幸福……

1979年春，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，并恢复了起义领将的名义。我一家四口也因落实政策而迁回了北京。此时 我已由一个 19岁的少女变成了有两个孩子的 33岁的少妇。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好转 我那形如死灰的心又渐渐活了过来。为了追回在西北边陲浪费的 14年青春年华 我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刻苦学习，考上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，并起早贪黑地利用工作、学习之余 帮助父亲撰写回忆录 或自己撰写纪实文学。过了不惑之年，我才闯出一条自己的路，荣幸地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父亲对我的成长和进步深感欣慰 同时也为我提供了不少的写作素材。正当我们父女认为厄运已去 苦难不再时 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我们推向了痛苦的边缘。

1994年春，医生发现父亲患了结肠癌。这对我们而言真是如同晴天霹雳。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一事实。然而 事实就是事实。医生从父亲的腹部取出了拳头大的一个肿瘤 并对我们宣布说 父亲的癌症已经是第三期了 手术后 最多再

活一年。这话我不敢告诉继母，更不敢告诉父亲本人，只能偷偷地在电话里告诉海外的姐姐们，让她们尽量都赶回来看看父亲。而我自己除了暗暗地担忧外，也只能是悉心照料，尽量多陪陪他老人家了。一年之后，父亲的身体出人意料地恢复得很快，不仅红光满面，而且精神极佳，不但能常常外出钓鱼，而且凡是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去外地视察或避暑等活动，他都兴高采烈地积极参加。我和继母都认为，父亲已经战胜了癌细胞，不会有事了。一个气功师来看过父亲后也说：“以沈老的身体状况来看，活 100 岁是没有问题的。”我喜欢听这句话，也愿意相信这句话。

1995 年底，我和丈夫去香港探望我母亲，原准备在香港呆三个月，春节前再赶回北京。孰料我们刚到香港一两个月，继母就慌慌张张地打电话告诉我说，父亲的癌症已经扩散了，而且是全面性地扩散，催我赶快返京。我顿时急得蒙了头，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睡。当时我们正在请人装修母亲转租给我们的住房，花了几万块钱，工程才进行了一半，但为了赶回京照顾父亲，我即准备放弃装修去订飞机票。正当这时，父亲突然来了个电话，叮嘱我把房子装修好后再回京，并说他的身体很好，只是继母在瞎紧张。电话里，父亲的声音洪亮，底气很足，确实也不像有病的样子。我这才稍稍放心一点，推迟了十天才返回北京。此时，父亲刚刚住进肿瘤医院，气色依然很好，红光满面的。但医生却告诉我说，父亲的癌症确实已经扩散到肺上、肝上和胰腺上，最多能活三个多月。当时我说什么

也不相信医生的话 我蠢愚地认为父亲决不会死 他决不可能被那小小的癌细胞打倒。我一面照顾他，一面找寻治癌的偏方、秘方。不久，我听说北京一家中医院有种叫“黄氏医圈”的特效治癌药。我立即跑去花了几千元把药买回来 让父亲服用。父亲服用后效果还真不错 精神明显见好 而且食量也增加了。父亲高兴得像对老朋友似地跟我一击掌 笑道：“我看这药不错 定能治好我的病。”

我也紧握父亲的手说：“我也有信心，相信你的病一定能治好。我的老爸可不是轻易会被打倒的，对吧！”一句话，说得我和父亲都笑了。

可是几天之后，医生发现父亲大便潜血，决定停止服用一切药物，甚至连饭都不让吃，每天靠打点滴输送营养和止血药 说是怕引起大出血。我们自然也不敢再让他服用“黄氏医圈”的特效药了。几天后 父亲的潜血不但没止住 而且潜血量越来越大 还不停地打嗝 连夜里都无法入睡。一位中医大夫开了几副中药才稍稍止住了打嗝。这几天我和家中的保姆轮换着守护着父亲。3月17日晚上，我实在有些顶不住了，勉强让继母的一个干女儿替我一夜。孰料 就在这天夜里 父亲大量便血，且呕吐不止，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，情况极为严重。那位干女儿要打电话找我 可父亲却说什么也不让她在半夜三更惊动我们，怕影响我们休息。第二天一早我接到电话，赶往医院时 见父亲面色苍白 正在艰难地喘息。我急忙扑到他床前 紧握他的手问：“爸爸你怎么啦 怎么会这样？”

到了这种时刻，父亲还在安慰我说：“没事，是药物反应。”

此时医生和护士都围在父亲床边忙这忙那，一位护士小姐要给父亲抽血去化验，可扎了两针都没扎进血管。我真的急了，毫不客气地冲她嚷道：“你们能不能换个技术高点的来。”大夫立即叫来了另一位护士，并要家属去北大医院借一个凝血管来。此时我真不愿离开父亲，但家属中除了 70 多岁的继母和我外，其他人都不在身边。我只好紧握一下父亲的手说：“爸，我去下就回来。”说完就匆匆走了。

万万没想到，我前脚一走，父亲就昏迷过去了。等我取了凝血管回来时，五六个医生正围着父亲在抢救，作人工呼吸。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领导都赶来了，正在聆听病房主治大夫的汇报。我意识到父亲已经不行了，顿时感到浑身发冷。半个小时后，父亲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。看着父亲睡着似的安详面容，我真恨不能扑过去狠命地摇醒他，问问他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急，为什么不给我一点预感，为什么头天晚上不让干女儿叫我，为什么偏偏在我没有陪伴他的那一天夜里出事，为什么临终前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……

纵然我心中有一百个“为什么”，一千个“为什么”，但我也只能在心里哭喊。我不忍心再去惊动他。他躺在那里是那样的平静，那样的安详。他慈祥的面容上甚至还带着微微的笑意，仿佛他跋涉了 83 个春秋之后，终于心安理得地获得了安息的权利一样。

父亲走了这一次他是真的走了。他走得那么坦荡 走得那么磊落。他不仅给我及其亲朋好友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敬意 而且给许多读过他著作的人们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。

在整个处理父亲善后的过程中 我欣慰地看到 许许多多的读者中 佩服他、谅解他的人还真不少。当时 最令我感动的是北京肿瘤医院太平间的一位 30 多岁的年轻师傅。

当父亲的遗体被送到那阴冷潮湿、位于地下室的太平间后 我一想丧礼之前父亲得独自一人躺在那里时 就心如刀绞般地难受 迟迟不肯离去，一再拜托值班的两位师傅好好照顾我的父亲。那俩位师傅最初都公事公办地说：“放心吧 到这里来的人我们都会好好照顾的。”

晚上我带着其他亲友再去太平间看父亲的遗体时 其中一位年轻的师傅已经知道我父亲的身份 他非常诚恳地说：“大姐，你放心吧，我打小就看过沈老写的书，打心里敬佩他。我会把他当自己的长辈那样侍候的。”他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感动得我直想跪在地上给他叩三个响头。

同时 在家父举行丧礼那天的情景也令我终身难忘。当时中央有文件强调要“丧事从简”但家父生前的亲朋好友还是让父亲最后“风光”了一下。他们主动出人出车 组织了个多达 20 辆车的灵车队。八宝山灵车队队长亲自跟随灵车去肿瘤医院的太平间接灵 并按我们亲友的要求 灵车队逆行好几里才转到长安街西行 前往八宝山悼念会场。前来悼念的多达上千人 其中除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领导之外 还有德高望重且